

HUIZHONGBIDAOHAI



水必到海



水(2003/15)



水終必到海

内 容 提 要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散文、随笔、杂文共一百篇。这些作品是作者五十多年来，在紧张激烈的战斗工作之余写作的。包括《柿园》名篇在内的散文，都有作家朴素端庄深沉委婉的艺术风格。作品寓深刻的思想内容于通俗浅近的叙述中，读后感到真切亲近。随笔看似信手写去，实乃蕴积日长月久，故意在笔先，意在笔下，意在字里行间，有力透纸背之感。杂文篇目虽不甚多，也足见其浓郁的火药味。讽刺入木三分，剖析淋漓尽致，痛快酣畅，发人深省。作家的思想发展脉络，也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水 终 必 到 海

李 蕤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3插图 377,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7·387 定价：3.00元

自序

(一)

我开始拿起笔，写一点文艺作品，是三十年代初期。写的当时，只是心里有许多话不说不行，便写了下来，不计工拙，更没想过要做什么作家；待发表了，就觉得责任已了，也没有考虑过什么出书。

当时，各种文学样式都涉猎一点，而在各种样式中，我更喜欢使用的形式是散文，因为它方便，无拘无束，可以及时反映急剧变化的生活，也便于抒写自己内心的情感。

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便是这个集子中的第一篇——《柿园》。

说到它，就得先谈谈我的家庭，我的童年。

我的故乡，在河南西部一个偏远的农村，祖祖辈辈，都是以农业为生。因为地处半山区，丘陵起伏，十年九旱。光绪三年，民国九年两次大旱灾，村中人饿死大半，人们一提起来便心有余悸。我的祖父是一个很坚毅而有远见的农民，为了对付旱灾，便种了五六亩柿树。我有记忆的时候，这些柿树已经成为大树了。柿树的特点是不怕旱，越早结得越多越稠，有这一张王牌，大旱灾的侵袭便不那么可怕了。柿树是春天开花，夏天结果，秋天果实成熟，冬天才把成熟的柿子翻晒成柿饼。因之，一年四季，它都是我们希望的中心，凝结着我们一家人的欢乐和忧愁。童年时代，我们用麦条穿柿花，挎着篮子上树采“红灯笼”，在枝叶茂盛

的树上玩“爬树猴”，……然而，这是过去的事，到了我执笔为文的时候，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柿园也失去了昔日的欢乐，只剩下日益贫困的忧愁。《柿园》就是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下写成的。

这一时期，我正在开封师范读书。当时从大的时代背景说，正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危机关头，东北四省沦陷，日军节节进迫，华北岌岌可危，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而且继续围攻工农红军，残酷镇压革命运动。我所在的开封师范学校当局，采取的便完全是法西斯统治。进步的、主张抗日的同学，被公开逮捕，稍有嫌疑的同学，也被监视、追踪，学期終了，以“操行不及格”为由无声斥退。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每一个爱国青年，都郁结着一腔愤怒之火。我这时候便完全抛弃了功课，一心沉浸在中外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从中找到启示和慰藉，我特别喜欢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和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我们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也自动组织起来，在地方报纸上辟专栏，办副刊，学习创作。收在这个集子里的除《柿园》外，象《吐诉》、《在边缘上》、《悼耶林》、《桌上哥尔夫》、《钠》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桌上哥尔夫》、《钠》，都是藉物言志的。当时我认为桌上哥尔夫球台，就是现存社会的缩影，而在球台上碰来碰去的那个球，就是青年命运的象征。在《桌上哥尔夫》中，我赞扬了“走一生，碰一生，永不得分”的球，在《钠》中，我也赞扬了不在水中分解，而是水中“嘶叫着，燃烧着”的钠。这两篇的思想与《吐诉》、《在边缘上》是一致的：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极其憎恨，不愿作现存社会制度的维护者，把向上爬看作可耻的行径，准备为追求真理，走一生坎坷艰难的路；但人生的路应该怎样走，真理究竟在哪里，在当时还是十分迷茫的。

一九三五年，我从开封师范毕业。当时师范生有一项待遇，即到江南教育发达的地区参观学习，同学们趁此机会，饱览了江

南的名胜。但此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读到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一到上海，便跑到北新书局，买了一大包鲁迅的著作：《二心集》、《三闲集》、《南腔北调集》，贪婪地读着，有时连名胜古迹也忘记了游览。记得从上海到杭州的旅途中，因为是夜车，全车厢的旅客都入睡了，车厢内寂静无声，灯火明如白昼，我一人沉浸在鲁迅的那些战斗杂文中，读到精彩之处，不自禁独自笑出声来。我极佩服鲁迅先生那一支饱和着思想而又犀利幽默的笔，自此以后，鲁迅先生的杂文便成为我用笔进行战斗的一盏指路灯。

（二）

一九三六年，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方面，日军步步进逼，连北京、天津也行将不保，而国民党反动派仍步步退让，继续执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投降政策；另一方面，共产党的联合抗日救国纲领深入人心，抗日的呼声响彻云霄。地火的运行是不可遏止的，霹雳一声，“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北平的学生，首先发难，河南的学生也起而响应，当时我正在河南大学读书，也投身到这一洪流当中。河南反动政府头子刘峙，被爱国学生运动吓慌了手脚，初则严密封锁学校，不准学生上街，继而派大批军警，荷枪实弹，阻止学生向群众宣传，面对这种形势，我的笔再也无法缄默，连续写了《大砍刀与救火龙头》、《不要净街游行》、《嘉奖》等文章，在《民国日报》的“中原”副刊上发表。

这一时期，我的视野扩大了，题材领域放宽了，对于有利于抗战的新文化运动，我都尽力参加。为了响应大众文化运动，我写了《文字和话不要分开》、《汉字不妨尽量通俗》，为了宣传文艺在抗战中的职能，也曾撰文和当时当地的“第三种人”作斗争，和黄震遐派的“民族文学”鼓吹者作斗争。有些文章已经散失，无法找到了。

左翼作家联盟，尽管在当时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然而在青年心目中威信很高，虽然出现“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但那两个口号都积极主张抗日，目标是一致的。然而此时此刻却出现了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认为文艺一接触政治，便会产生公式化、概念化。当时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反差不多运动》，便是这一主张的突出代表。他的文章，打的旗帜是“反差不多”，实际上矛头是指向当时的抗日文学运动。文章责怪抗战文学是“为了追逐‘时代’这一空洞的名词，三十万青年腐烂在泥土里”，指责追求革命但艺术工力还不够的青年“不是用大脑思考问题而是用脊椎骨在反映问题”，他对歌颂光明，揭露黑暗但还比较粗糙的作品，抱着厌恶诅咒的情绪，说“这些作品名为歌颂光明，诅咒黑暗，不知道它本身就是黑暗。”这篇化名炯之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先生所写。我当时虽自知人微言轻，无力和文坛名家相抗衡，但对于他这些奇谈怪论，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化名肖云，写了《反差不多运动的根值数》一文，对他进行反驳。炯之的文章，和亿万青年的看法想法是相悖的，发表后许多人纷纷反对，于是这场“反差不多运动”便很快偃旗息鼓了。今天在这个集子中选入此文，一是纪念抗日前夕文艺界的一场被人遗忘的斗争，同时，对于今天有些青年朋友，由于对“四人帮”政治的反感，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文艺离政治越远越好，要求艺术绝对自由，绝对独立，也许多多少少有些借鉴作用。

正在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极为复杂的时期，文艺战线熄灭了一盏指路明灯，鲁迅先生病逝了。他给千万青年带来的悲恸是无法言喻的。

我对先生的爱戴和景仰是发自内心的，当时就写了《悼鲁迅先生》一文，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上发表。事隔四十多年，重读此文，仍感到一切仿佛如昨。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们的

心里。

(三)

芦沟桥的炮声响了，全民抗战爆发了，我离开了河南大学，走向抗日前线。我不会拿枪，只会拿笔，便做了一名新闻记者。一开始参加在郑州创刊的《大刚报》，在豫北前线采写战地通讯，但当时指挥京汉路前线的是“长跑将军”刘峙，他败退的步伐比我们的笔尖还快得多，许多战地报道还没来得及发表，那些地方就沦陷了，致使辛辛苦苦的战地采访成为无效劳动。

一九三八年春，我们参加了徐州大会战。当时“台儿庄大捷”成为全国新闻界报道的中心，全国著名记者云集徐州。我奉《大刚报》的派遣也到徐州做战地记者，但刚刚写了几篇通讯，日本兵便从西边迂回包抄切断陇海路，向南切断了津浦路，把我们困在包围圈中，成为釜底游鱼。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幸好碰上了范长江同志，随他找到了突围大军。经过八个昼夜连续不断的徒步跋涉，才钻出了敌人设下的死亡圈。及至绕道回郑州，黄河已被扒开，开封已经沦陷，郑州岌岌可危。此时《大刚报》也已南迁，赶到信阳，报社还没走，但老板却说：“报社无法维持，我们也要疏散人员”，把我解聘了。茫茫大地，无处存身，哪里也找不到为抗战效力的机会。

当时“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喊得正响，我便和爱人宋映雪同千万爱国知识青年一起逃奔武汉。我们和于黑丁、曾克、臧克家、碧野、田涛等一群，先后住在武昌海马巷一家既肮脏又破旧的小客栈里，谁也没有职业，每天除跑警报外，便是为如何吃饱肚子发愁。

这时候，各人都在自找出路。我们感到跟着人流往大后方跑没有前途，决定奔赴延安。由评论家王淑明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介绍信。马上就要远走高飞了，我和爱人又牵挂起远在

家乡的生活无依的父母，又决定回去最后替他们安排一下生活再走。这样又回到河南南阳。但是却没料到，我们刚到南阳，武汉广州很快就沦陷了，与此同时，胡宗南也封锁了大西北的通道，去延安的计划便成为泡影。

一九三九年秋，经碧野介绍，到洛阳《阵中日报》工作。那个报纸，群众称之为“半边报”。所谓“半边报”，即副刊还是好的，而新闻却是伪“中央社”一家垄断的。为了打破“中央社”独家对新闻的垄断，我受范长江同志的委托，成立了国际新闻社洛阳通讯站，把解放区的稿子转向桂林总社，然后向全国各报分发；我们用编辑部的假“护照”把从重庆来的“自己人”送到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我们组织青年记者学会，团结进步青年，……总之，我们尽力之所及，想在黑暗中偷运进一点火光。然而，在国民党鹰犬遍布的险恶环境中，我们的活动很快地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九四〇年冬我被三青团头子王采芹逮捕，关入洛阳的“劳动营”，碧野事先已只身随苏联顾问南行、奔五战区。经国新社多方营救，我被保释出狱，那时国统区已是皖南事变后的反共高潮，《阵中日报》整个改组，所有进步的战友，一律被解职，我也被报社开除，成为“共党嫌疑分子”。抗日无功，爱国有罪，这就是当时文艺工作者的命运。

一九四一年，应老友臧克家、碧野、田涛等人之约，到河南漯河“三一出版社”，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大地文丛》。《两种傻子》，《未完成的画像》，就是那一段生活的脚印。但在那里只有一个月，由于战局吃紧，朋友们便又象飞蓬般四散了。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空前的大旱灾，农民活活饿死三百多万，国民党政府不仅见死不救，反而加重剥削，并严禁各报刊透露灾情。《大公报》一个记者过境，写了篇通讯，报社据此写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立刻被罚停刊三天。在这样的情势下，亿万无告的灾民，只能大批默默地死亡。这时，南阳《前锋报》写信

给我，让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到灾区走走，写些反映灾情的报告。我这时刚从“劳动营”保释出来不到一年，担负这项工作，明知是自讨苦吃，然而我想，一个拿笔的人，到这种时候还不敢为人民说一句话，实在是生不如死！便横下一条心，接受了《前锋报》的委托，化名“流萤”，写了十几篇通讯，为那段大灾留下了剪影。

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是戴着镣铐抗战的。大敌当前，人民却毫无民主，毫无自由。中原地区，更是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最集中的地方，人民所受的苦难是双重的，知识分子，除了国难家仇以外，还有思想上的迫害，“洛阳劳动营”，叶县“青年集中营”，“伏牛山工作团”，都是令人心悸的地方。在抗战悠长的八年中，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就是和这块苦难的土地，这些苦难的人民生活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中，既没有工笔细描的时间，也没有精雕细刻的心绪，只能在矛盾的夹缝中对现实作一些速写，《无花果树》、《怀念开封》，《二三记忆》、《寂寞的胜利》等，便是这段苦难岁月里的产物。

南阳《前锋报》社长李静之，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办报的宗旨是：主持正义，为民先锋。自从我作为他们的特约记者写下《豫灾剪影》后，便到《前锋报》工作，主编副刊《燧火》。这张报纸用麻纸印刷，条件很差，但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画家谢瑞阶给我们画报头，嵇文甫先生给我们写文章，远在重庆的朋友，在新四军中工作的朋友，都经常为这个副刊写稿。“燧火”，顾名思义，是用燧石敲打出来的火花。它的火光是十分微弱的，然而，它昭示着一个真理：“有石在，火是不会熄灭的”。在这一个小小副刊的周围，有几十双年青的手，几十颗跳跃着的心。

一九四五年，日寇大举进攻，河南全省沦陷，我们掩埋了印刷机，疏散到内乡山区的农村。临逃难时，很多衣物都扔掉了，但《燧火》的文稿、合订本却没有舍得丢掉。这个集子里的《燧

火一年间》，便是这段生活的印记。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们在山沟里听到了欢庆日本投降的爆竹声，当时真是欣喜若狂，认为八年的苦难已经到了尽头。我们兴高采烈地从地下掘出机器，回南阳重新复刊。可万没料到，迎接我们的不是万里晴空，而是一场新的风暴。

(四)

抗战胜利后，我们和千千万万人民一样，希望和平建设的日子迅速到来。当毛主席飞赴重庆谈判的时候，我们报纸用“一行足使万人欢”的大字头题，表示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当旧政协举行会议的时候，我们彻夜坐在收发报机前，等候万里之外的佳音；旧政协会议圆满闭幕，我们报纸刻了比鸡蛋还大的特别字号，用“天上月圆，地下团圆，政协圆满成功”的大标题，庆祝政治协商的成功。但是，这个希望的肥皂泡很快便破灭了，蒋介石很快便撕碎了停战协定，重新发动了内战。原来的汉奸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了专员司令；原来停止的征购征实，又重新下令开征；原来已拆除的城墙，又在重新修建，……明明白白，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将人民推向内战的血海。目睹这样的现实，我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接二连三发表了许多短文。《血不能白流》、《四位大学生的死难》、《愕然》、《手与手间》、《当真》、《日本兵的壁上诗》等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如果抽空时间地点，也许会觉得这些作品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但我们当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却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的。

事实也果然如此，反动党政特务机构，立即把《前锋报》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盯梢、监视、搜查之类的事件，接踵而来。社长李静之本是一方人望，此时也被他们视为仇敌：“将来城外炮声一响，城内开枪先杀李静之”！至于我和总编辑孙梁田则早已列入黑名单。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离开南阳。

然而我们只要有一分可能，决不放弃战斗。一九四七年春《前锋报》又和《中国时报》在开封出联合版。我担任名义总主笔，实际主要是主编副刊《春蛰》，《春蛰》的报头仍是谢瑞阶制作的，寥寥几笔，画出了大地胎动，万物复生的新意；老诗人苏金伞写了《地层下》一诗，含蓄蕴藉，暗示革命力量正在积蓄壮大。我在《春蛰》的发刊词中，也以曲笔道出这块园地的宗旨：惊蛰季节到了，万物苏醒的时候到了，这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编辑《春蛰》的一九四七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那一年，胡宗南曾一度攻陷延安，一时气焰万丈；但不久，刘邓大军就过了黄河，挺进大别山，直指武汉，改变了整个战局；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那便是席卷全国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场风暴到了开封的时候，河南大学同学，首先响应，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时开封有十一家报纸，绝大多数都是反动派的叭儿狗，应声虫，斥责学生运动“图谋不轨”。有个知名学者，也貌似公允地站出来，指责学生运动是“拉偏捶”，是“只敢得罪国民党，不敢得罪共产党”，说学生这样做是象《水浒传》上火并王伦一样，吴用假装劝架，实际上是让林冲杀王伦。这位学者欺骗性很大，又是我们报社的董事，他坚持要我们登载他这篇文章，我们当然断然拒绝。紧接着，我们又报道了反动军警包围河南大学、逮捕大批学生的事实真相，我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也给《大公报》发了电报，揭发他们用美式手铐逮捕学生的罪行，这就激怒了河南反动当局，他们于六月一日前夜实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被捕者达一百多人。在新闻界七人中，《中国时报》和《前锋报》联合版便被捕四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此次大逮捕之前，我们便风闻到要来报社抓人的消息，要抓什么人虽然不知道，但我和孙梁田都自知在劫难逃，一来我们在南阳《前锋报》时便是他们早想下手的对象，二来又毫无靠山。

怎么办呢？逃，是无处可逃的，而且，那样正好授人以柄，说你是“畏罪潜逃”，对报社不利。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先发制人，在报纸上揭发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的贪污，这样，即使被捕，也给他一个“挟嫌报复”的罪名。谁执笔呢？一致推我，义不容辞，于是我在大逮捕的那一夜，熬了一个通宵，写了一篇揭发田粮处长贪污的社论，刚刚脱稿，军警特务已经到了门口。这样，我又一次被捕了。可惜这篇社论没有找到，未能编入这个集中。

紧接着，国民党公开颁发了“动员勘乱令”，报面上公开污蔑共产党为“共匪”，对革命知识分子进行更残酷的镇压，我们报社的地下党员连续被捕，经常搞得一夕数惊。在一个隆冬之夜，军警特务架着云梯，越墙而过，从房坡上跳下来，搜查我住家所在地的开封南京巷茅胡同汜水会馆，全院邻居的青壮男子都被集合起来，五花大绑，我的老母妻儿都被用手枪指着头，不准说话。然后他们在我家翻箱倒柜进行搜查，次日还有便衣在门前埋伏。这些记忆是永难忘却的。

(五)

一九四八年六月，开封第一次解放。从报纸上，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真令人欢喜欲狂。特别令人欣慰的是我一贯尊敬爱戴的师友和战友们如嵇文甫、王毅斋、罗绳武、郭海长、刘国明、苏金伞等一大批同志，都已和旧社会彻底决裂，随大军进入了光明的豫西解放区。我此时正在北平《新路》杂志社做助理编辑，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到这些老战友身边。

当时，京汉铁路、津浦铁路、陇海铁路都已中断，只剩天空还有一条路。我便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回故乡。飞机到郑州时因机场大雨，无法降落，只好又绕道武汉机场降落，次日才到达郑州，易服潜回故乡荥阳。那时郑州已成了国民党手里孤立的一个据点，广大农村已经成了双方“拉锯”地带。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携老母妻儿进入解放区。为了避人耳目，对外扬言是搬家往北平。出门向东先走十里，然后折回头往西。双鬓斑白的叔父牵着毛驴去送我们，临别怆然下泪，因为当时是一人投八路就会满门遭斩杀的。

当时的巩县是个“阴阳界”，从巩县到洛阳是解放区，巩县以东到郑州，暂时还属于国民党政府。到了巩县，就逃进另一个世界。

那时，从洛阳到巩县，还有一段铁路可以“通车”。但火车很奇特，既非有座位的客车，也不是铁皮的“闷子车”，所谓车皮，只是一块木板，火车头只是一个破汽车头改装的。司机到站后，先到附近村子里吃“派饭”，然后回来开车。开车之前先得人推，才能缓缓发动。老幼妇女坐在车上，我们青壮年人都在后面推。这就是解放后中原地区的第一列火车，而就是这样一列火车，如慈航普渡，把我们送到解放区去的。后来，为了纪念这次旅行，我还在《长江文艺》上写了一首快板诗《中原第一列车》。

到了洛阳，当我看到城墙上斗大的字“共产党万岁”时，真好像置身梦境。洛阳这块土地我是熟悉的，十九岁我就在这里读书，请过愿，挨过饿，坐过牢。以前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打倒、诅咒共产党的标语。“共产党”和“万岁”连起来，这样堂堂皇皇，扬眉吐气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还是生平第一次。托尔斯泰的《复活》中，描写玛丝洛娃从黑暗的牢狱中一下子看到阳光时感到目眩，大约就是这样的滋味吧！

当时洛阳已是稳定的革命根据地。接待我们的是交际处长赵政一同志，他在抗日胜利后便代表八路军在开封与救济总署联系，我们是老朋友了。洛阳文化馆长巴南冈，对我们极为热情，我到的第二天，就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乒乓球比赛，并荣获第一名，得了一条香烟的奖品；市委书记周季方热情地请我们吃饭，问寒问暖，时时处处，都使我感到是到了自己的家。

当时的中原局，在宝丰农村。我从洛阳到中原局去的时候，组织上给了我一匹马，还派了一名年青的通讯员沿途护送。当我骑马南行的时候，真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多少年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黑暗的国民党统治区，被人践踏得不如一只蝼蚁，成年累月，缺衣少食，担惊受怕，受的是和囚犯差不多的待遇，对旧社会早已从失望到绝望，当时就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我到解放区去，一定要写篇文章，吐吐胸中积郁多年的闷气，况且，在这光明与黑暗大决战的前夕，广大中原地区象我这样的青年，还大有人在。我应当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召唤他们到解放区这块真正自由的新天地来。在这样的心情下，路过一个村庄休息的时候，我就把马系在树上，倚着大石头写下了《水终必到海》这篇散文。《豫西日报》对此文十分重视，全文发表并加了按语。这个集子里收入这篇文章，并把它定为书名，一是纪念这段生活，二是我感到“水终必到海”也恰好集中概括了我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三则也是自我鞭策：永远不忘参加革命队伍时自己的誓言，永远不忘自己只是集体海洋中的一滴水，如果离开人民、离开集体就会干枯。

(六)

从憎恶旧社会，背叛旧社会到熟悉新社会，为人民服务，仍旧是一个艰辛的历程。

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我既没能够到光明的延安，又没有到“大后方”的重庆，长期生活在反动统治最严密的中原地区，如同坐在闷罐头中，对解放区的新文艺接触很少。一九四六年秋，我有机会到上海，在友人的介绍下参加了黑茶山殉难四烈士的追悼会。在会后的晚会上，看了欧阳山尊和李丽莲合演的《兄妹开荒》，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倒不是为《兄妹开荒》题材本身，而是因为很长很长的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

以及许多旧现实主义作品中看见的普通老百姓，都是被压得弯腰曲背，充满精神奴役创伤的形象，而象《兄妹开荒》中两兄妹那样挺胸昂首，喜气洋洋、乐观向上的群众，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从内心深深地感到：这才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文艺！以后，纪念毛泽东延座讲话廿周年时，我还写了篇散文《难忘的记忆》，纪念这次看演出的印象。

一九四九年秋，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怀仁堂召开。这是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国统区革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都亲临大会祝贺。毛主席在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只说了短短的几句话：“欢迎你们，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就有理由欢迎你们”！这短短几句话，象一颗种子一样，落入我们每一个与会者的心田。

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之前，我在《开封日报》、《河南日报》编副刊，文代会后组织上派我筹备河南省文联；筹备期间，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在中原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原局党委决定所有干部无例外一律参加，河南省委提出“关住门下乡土改”的口号。当时刚刚解放，农村还相当贫穷，我们下去每天只能吃到小米咸菜，睡觉也只能睡麦草，但大家斗志昂扬，精神愉快。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反霸斗争，直至焚烧地契，插标分田，通过每一个环节的斗争，我们看到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变。在这时期，也有时拿笔写些东西，但那时的农民，大半是文盲，为了使他们听得懂，便不得不借助民间流行的说说唱唱形式，我当时就用河南坠子的形式，写了《李玉仙翻身》、用快板诗写了《三桌一案板》等，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土改给了我些什么》，写的是我在土改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我第一次亲历目睹了农村严酷的阶级斗争，懂得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

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作协组织了一批作家、画家、音乐家、戏剧家到朝鲜前线，我即报名参加，团长是巴金